

◎ 杨旭辉 著

清代经学与文学

——以常州文人群体为典范的研究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 杨旭辉 著

清代经学与文学

——以常州文人群体为典范的研究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经学与文学:以常州文人群体为典范的
研究/杨旭辉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6. 7

ISBN 7 - 80729 - 046 - 3

I. 清... II. 杨... III. 经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6164 号

书 名 清代经学与文学

著 者 杨旭辉

责任编辑 卞 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 211523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印 数 1—1500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80729 - 046 - 3/1·28

定 价 27.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今夫齐竽秦筑,以异声而不和” ——清初学术主旋律中的“噪音”	(8)
第二章 “岁寒松柏,有节之称” ——常州学人品格谈	(18)
第一节 “自笑生平耽蠹简,又看此癖代相传” ——历史、家族传统的回顾	(18)
第二节 “尚留薪木余馨在,直接渊源百浚长” ——东林精神的复兴	(27)
第三节 “地非近市心常远,貌不趋时性自狂” ——“狂狷”与“慧直”的考释	(35)

第三章 “深隐避患于当时,未尝不期有以明示于后世”

——朴学家的价值取向与学术上的苦心经营 (58)

第一节 “良玉在璞常含贞,明珠出海照寰宇”

——朝野学术的分野 (58)

第二节 “避触时忌,聊以自藏”

——学术问题的政治问题 (67)

第三节 朴学方式、理路的延伸和拓展 (91)

第四章 “情随事过凭诗遣,愁上心来倩酒浇”

——际遇·沧桑·性灵 (106)

第一节 “善言心曲风人义,莫倚才高笑小诗”

——毗陵诗派的认知价值 (109)

第二节 “世间不少伤情处,写出回肠别有才”

——幸与不幸的对立统一 (133)

第三节 崇尚杜诗的文学风潮 (157)

第四节 “使君双鬓雪霜侵,傲骨雄才感喟深”

——毗陵七子的诗歌创作 (169)

第五章 “太息打窗声渐近,子山词赋不胜哀”

——骈文与词的中兴 (188)

第一节 “百结柔思谁解道,便应作赋拟相如”

——骈文的情感向度与认识难度 (188)

第二节 骈文兴盛的原因 (199)

第三节 “自古离忧,多传词赋”

——骈文的特点 (213)

第四节 骈文巨手洪亮吉

——附论:洪饴孙、洪麟孙、孙星衍、刘嗣绾 (234)

第五节	“当筵意气消雄辨,倚栏心情付小词” ——从《词选》到《蓉影词》·····	(246)
第六章	常州公羊学的兴起和近代文学风尚之开启 ·····	(277)
第一节	“经心阅云雾,豁若日星皎” ——庄刘学术之剖析·····	(281)
第二节	近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与阳湖文派·····	(299)
第三节	余论:关于龚自珍《识某大令文集尾》的疑案 ···	(317)
主要参考文献	·····	(323)
后记	·····	(335)

引 子

前辈学者论及乾隆、嘉庆两朝诗歌时，曾有过“螳肚”、“蜂腰”之讥。而对乾嘉学术思想界的认识，更有龚自珍“万马齐喑究可哀”作为不刊之论。由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精华思想”在作祟，在众人的眼中，这一段历史也就成了一块“槽头肉”，习古代者往往弃之若芥；研究近代者又置若罔闻。严酷的文网，以及对“异端”思想的强权钳制，这无不使得才人们感到史无前例的窒息，缄口不语也就成了多数人最为明智的避祸之道，这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却怎么也不能够回避这一历史进程，传统画论中不是讲“从无笔墨处求神理”，“从无笔无墨处参法度”（王绶《书画传习录》）吗？乾嘉学界文坛就如同“无画之画”，喑哑无声的寂静中并非死水一潭，在寒冽的历史长河中，其底层却不乏潜滋的漩涡与暗流，这就是葛兆光先生所说的：

“‘空白’的背后，其实写满了未发表的文字”。^①其间自有一批秉节砺操的乾嘉学子，以其深婉而独特的方式，在沉默中蓄势，使“诗书之泽”不绝于人世，静待适宜的气候与土壤。一旦时机成熟，便有决渟水而致海之势，正所谓“诗书之泽，惟积乃厚，如水之渟，流演可久”^②。龚自珍一直被我们视为历史的英杰，他那振聋发聩的“春雷”，难道不是“在沉默中爆发”的必然产物吗？

想要真正透彻地了解中国近代启蒙思想与文学的发展，龚自珍自然是不可忽略的一环，那么，他那些天才般的思想和创作是否天赋的灵感或者是横空出世的呢？大凡对龚自珍有些许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在三十岁前后，学术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毅然舍弃早年从外祖段玉裁那儿承受的正统考据之学，转而从刘逢禄习公羊之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③对于龚自珍这样一位极其自负的才子，要使他能如此心甘情愿的伏谒于常州，着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也许答案就在龚定庵下面的那首《常州高才篇送丁若士履恒》诗中，不妨一读：“丁君行矣龚子忽有感，听我掷笔歌常州。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我生乾隆五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门下宾客盛（谓金坛段先生），始见臧（在东）顾（子述）来哀哀。奇才我识恽伯子，绝学我识孙季述。最后乃识掌故赵（味辛），献以十诗赵必酬。三君折节遇我厚，我亦喜逐常人游。乾嘉辈行能悉数，数其派别征其尤。……常人倘欲问常故，异时就我来咨諏。勿数耆耄数平辈，蔓及洪（孟慈）管（孝伋）庄（卿山）张（翰风）周（伯恬）。期于鼎鼎八九子，奇人一董（方立）先即邱。所恨不识李夫

① 《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② 钱维乔《梧冈公墓志铭》，《毗陵吕氏族谱》卷一四。

③ 《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六，《龚自珍全集类编》卷十七。

子(申耆),南望夜夜穿双眸。曾因陆子(祈生)屡通讯,神交何异双绸缪。识丁君乃二十载,下上角逐忘春秋。丁君行矣龚子忽有感,一官投老谁能留。珠联璧合有时有,一散人海如凫鸥。噫!才人学人一散人海如凫鸥,明日独访城中刘(申受丈)。”(《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一五)在定庵的师友中,常州人竟如此之多,且复有这般影响力,其间的学术渊源与师承自然无须赘述。

龚自珍在诗中所说的一切并非溢美浮夸之辞,常州文人在乾嘉之际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始终处于有清一代学术思想进路的潮头。“是当清经学汉学极盛之会,吾常州与苏州、徽州,鼎足而三,各得二人焉,苏州惠栋、江声,徽州戴震、程瑶田,吾常州则臧镛、孙星衍也。”(顾实惕《常州文学之回顾》)虽然顾氏之言还不是十分严密,尚有讹漏,但基本上反映了常州文人在古文经学中的突出地位。如果说古文经学领域尚有苏、徽、扬诸州与之相颉颃的话,而常州高才在今文经学方面可就堪称独领风骚了。要想考察清代今古文经学的演变和更迭,常州文人团体无疑是最恰当不过的范例,因为他们在两种迥然相异的学术领域中,都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研究素材。常州开府,旧隶八县,就其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艺术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无一不能超离而独立作论,鉴于精力与篇幅之限,拙著仅以府治及武进、阳湖两县为常州学术文化之代表,诚一鹑知味也。^①若关一时一地风习所尚,乃至学术文化流变过程中的背景趋势,亦偶及无锡(包括无锡、金匮)、宜兴(包括阳羨、荆溪)、江阴诸县。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清代经学今古文之争视作“清学分裂之导火线”(第72页),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将

①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五《常州忠义祠》条,认为把无锡、江阴等籍的忠义之士列入常州忠义祠中,似乎不妥,因为他们“非郡城中武进人也”。由此可见,在当时就把武进、阳湖作为常州府城的范围的,且今日武进亦已撤县,并入常州市。

乾隆后期到嘉庆时期,活跃于学界和文坛的一批常州文人的建树和发明,视作引燃这条导火线的思想火花。这星星之火,终将引燃起近代启蒙思想的燎原之势——龚自珍、魏源直至康有为、梁启超。

这一批处于中国社会近代化演进和学术传承兴替转捩点上的常州先哲们,思想的火花时时迸发,但来自强权的禁锢与干涉,使他们还不能真正做到思想的完全自由发表,假使他们果然将心里的感想和盘托出的话,也必为主流社会所不容,乃至招来覆巢毁卵的悲剧。即使是业已发表者,也必须假借或多或少的言论虚饰来保护自己,这就显得更加深婉曲折,于是就造成了今人的层层隔膜。这正如迪师在《谁翻旧事作新闻——杭州小山堂赵氏的“旷亭”情结与〈南宋杂事诗〉》一文中所说:“际此言行钳制日严、心灵益见禁锢的特定时代,具体生存生活于此地域空间的士人,究持怎样一种心态?是均皆言不及义、无动于衷,抑或讳莫如深、心魂裹缩?或则皮里阳秋、别具怀抱?尽管历经各式各样的禁毁、删改,文献钩稽已大不易,然而倘若对此不予以拾遗补阙、探幽发微,思想文化史程自不免留存空洞。”而近世多种文学史著“莫不仅能掩其皮相,粗疏褒贬而无以斟原彼深心。”^①事实确实如此,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很难看到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的豪情,而是一种近乎雕虫的闲工夫,这种“软性文章”在今人看来恐怕就成了一种罪名,也就极易为持“精华思想”的史家所摒弃,上不了他们张贴的“光荣榜”(或谓“点将录”、“录鬼簿”)。而事实上,这些“软性文章”却也尽有血泪写成的,如果遇着了明眼人,还是可以看出“一把辛酸泪”来的!对此,常州诗人吕星垣在给友人的论文书信中就有过这样的自白:“去翳拔塞,忽然见作者之心。”^②要想成为明眼人,真正做到去翳拔塞,就必须透过虚饰,扯破隔膜,将自己深潜到前贤所营造的精神空间和灵魂深处,批文入情,使自己首先成为

① 《文学遗产》2000年6期,第48页。

② 吕星垣《复严明府论文书》,《白云草堂文钞》卷三。

一个有灵魂的人。记得西方就有一位哲人这样说过：“有灵魂的人可在诗中找到知己。”否则，这段历史及其学术文化依然是一块无人问津的“槽头”，也许常州学人、乃至乾嘉大师们在九泉之下真要慨叹：“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泪尽而继之以血也！”（刘知几《史通·自叙第三十六》）

为了廓清文学史和学术思想史上的诸多误解，更为了避免乾嘉先哲们在九泉之下因自己凝结在文字中的心迹和幽微之意被后世构诬而“抚卷泪尽”。特撰此稿，以常州文人群体为典范，对乾嘉之际噤若寒蝉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文化思想活动做一次全景式的扫描。要真正做到“全景式”的展现，首先在思维方法上必须对我们所熟悉的线性模式有所扬弃。长期以来，正是我们习惯了这种线形的思维方式，所以在讲到乾嘉的学术活动也好，文学活动也罢，都将它们纳入到一个显见的政治文化吸引子——文字狱——所建构的盆域之中，并以“万马齐喑”作为囊括一切的唯一定论。当然，笔者从不否认文字狱是研究清代文化无法回避的初始条件，但如果一定要差强人意，叫人坚信，文字狱这一因子造成的文化态势，就如脑袋上的“猪尾巴”那样的一致，却未免有些困难。因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意识形态的范畴，事实上存在着不少特立独行的离异者和分形结构。而西方自然科学家所提出的混沌理论倒为我们更全面真切的理解清代学术思想和文学活动有着积极意义：“初始条件的整个领域可能趋向于相同的渐近解或吸引子，即所有初始条件似乎都在同一个盆域中。”^①联系到清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历史，文字狱的趋同影响只是一种总体的描述，但并非没有例外，而事实证明，“吸引盆的边界同样具有十分复杂的上述分形结构。”（第33页）正是由于分形和离异的

① David K. Campbell 和 Gottfried Mayer-Kress《混沌与政治：非线性动力学在社会—政治问题上的应用》，见[美]C. 格里博格和 J. A. 约克编《混沌对科学和社会的冲击》，湖南科技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22 页。

存在,所以,只要“一个微小变化可能使盆地边界发生全局性,非线性移动,以至初始点集分裂成趋向不同吸引子的子集。”因而我们也就能够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许多混沌系统中似乎存在稳定区域,其中外部干扰迅速消除。如果在该系统的稳定域施加外部控制力(量级不大),其影响可用于诱导原混沌系统进入到一个几乎有任何行为的新状态。政治系统中宣传与大规模控制的联系是显然的。”(第47—48页)应该说,乾嘉朴学大师以及文学家对文字狱这一吸引子施加的变量绝对不能称之为大,借用古人的话来说,就叫“草色遥看近却无”,因为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下,事实上是不能够、也不允许把自己的想法明示出来的,只能在表面上显现出一种顺从的稳定态势,但历史的演进就在这般“草色遥看近却无”中得以进阶,而进阶演进的原动力却是那在当时谁也不注意的潜隐的分形。因此,拙著也将着力于为人们所忽略的“分形”者,其中虽有我们习称的大家(其实,就是对这些大家,我们的研究也没有进行得非常透彻深入),而更多的将是那些被人称之为小家,或者不成家的人。因为在文网深密的“吸引盆”中,若声名显赫,且身处权力中心,只要有丝毫的非妄之心,也断难逃出圣主法眼的,更何况还有众多耳目。只有在远离皇权的在野文士群体中,才可能有些许幸免于难的离心文字的遗存。对此,清代的文人自己就有过明确的表述。常州著名诗人和诗论家管世铭为同郡无锡诗人冯培(字玉圃)《鹤牛巢诗集》作序时讲到这么一个现象。在权力中心伺奉皇上,这是许多文人学士梦寐以求的事,在常人看来是人生之大幸。然而就是这么一批饱学之士,经常要应命与附庸风雅的帝王一起吟诗作对,但每当“猝遇牵率酬应”之时,文人们的表现往往是“亦如尘弦涩指,弹不成声。岂人才不如昔哉?”在与冯氏的诗歌交往过程中,他逐渐悟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盖以所处既非言诗之地，所值又未必皆可与言诗之人。”^①在皇帝身边的侍臣这一社会角色，决定了你的话语方式不能是有真性情的流露，否则就可能动辄得咎，只因为所处非言诗之地，所接非言诗之人。而当管氏与之相契恨晚之时，见到玉圃私藏秘不示人的诗歌时，长期困惑他的一大疑团——冯氏有诗名而从不见佳什这一现象——方才消释，并惊叹其才。正乃是：“长安有笼复有筌，禽邪鱼邪拘盈千。一客避器掩双户，不雪亦作袁安眠……”^②

有鉴于此，笔者始终认为，清代文学的研究绝对不能把自己的眼光盯在几个所谓的名家和大家身上，那无疑是固步自封。拙著主标题所力求的境界就是要使自己的研究视野尽可能开阔，取证的范围在横向上尽可能广，当然其中所涉及的文人学士也就不受身份的限制，也不仅限于常州一府，以免作茧自缚，见木不见林。但即便这样也并不是笔者对“全景”理解的全部，所谓“全景”，还指纵深方向上的开掘，副标题之以常州文人为典范的原因，前文已述，以这样一个带有转捩承接意义的士群为范例，对先贤心灵深婉隐秘处作一次细致准确的探幽发微，则可以清晰的展现我们民族的心灵史上的一段空白。

对于“空白”，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倒有一段精彩的论说，姑以之为前奏作结：“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

① 管世铭《鹤牛巢诗集序》，《清文汇》乙集卷四十五。

② 常州文人蒋麟昌诗，见陆继辂《合肥学舍札记》卷五。

第一章

“今夫齐竽秦筑，以异声而不和”^①

——清初学术主旋律中的“噪音”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第十部分《经学复盛时代》(第341页)中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抵，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少，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这段论述，为我们清晰地描绘了清初经学史的演变，大致不诬。由此可见，清代学术史的流变是由兼采综取和多元汇聚开始的。在这期间，我们可以历数出诸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颜元、李塨等一大批一流的学者，他们大多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探求“博综经世多方之学”(钱穆《国学概论》第267页)。

^① 洪符孙《跋蒋伯生所藏孙季述先生手札后》，《齐云山人文集》。

学以致用，这本是好事，可以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但问题就在于清初诸儒所谓的致用是有其特定的内涵的，对此钱穆先生有过一段极为精深的阐释：

若夫清初诸儒，虽已启考证之渐，其学术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经学考证限也。盖当其时，正值国家颠覆，中原陆沉，斯民涂炭，沦于夷狄，创巨痛深，莫可控诉。一时魁儒畸士，遗民逸老，抱故国之感，坚长遁之志，心思气力，无所放泄，乃一注于学问，以寄其守先待后之想。其精神意气，自与夫乾、嘉诸儒，优游于太平禄食之境者不同也。又况乎宋、明以来，相传六百年理学之空气，既已日浓日厚，使人呼吸沉浸于其中，而莫能解脱。而既病痛百出，罅漏日甚，正心诚意之辨，无救于国亡种沦之惨。则学者怵目惊心，又将何途之出，以为我安身立命之地，而期康济斯民之实？此又当时诸儒一切己之问题也。（《国学概论》，第246页）

抛开文中对乾嘉诸儒的不确评价，这段分析确实深入到清初学者的内心最敏感处，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然而，以顾亭林为代表的大儒们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却只能言无可验，其势不长，几为绝学。其中的理由其实再简单也不过了，作为满清的统治者，他们的卧榻之下，又岂能容许他人酣睡？于是乎，历史上焚书坑儒的一幕又一次重演，凡及前代史实，尤触忌讳。直到“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对于历经甲申之变的清初大儒的著作就更为关注，“自明之亡，一两大儒，孙氏则《夏峰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定》，及诸文士侯（方域）、魏

(禧)、邱(维屏)、彭(士望)所撰述皆以诋触见戾。”^①

据现有的文献材料,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四库全书》的编修是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字狱。当然,文字狱并非弘历的发明,其祖康熙帝手中已不乏此恶行。但是,康熙深谙中原文化,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但采用文字狱这样的“大棒政策”,更兼用“请君入彀”的怀柔政策。因为在康熙帝的心中非常清楚,想要制汉,在政权上取得绝对的强势,必须占领意识形态这个战略制高点,而通过位居弱勢的满族文化来瓦解汉人的抵触情绪,崩溃他们的精神和意识,是断难实现的幻想。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利用汉族政权原有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制度基础。通过恢复科举和设立“博学鸿词”科,以达到延揽人心、诱导入彀的目的。虽然,诸如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等志士仁人至死不受清廷之召,但是人们处世态度的变迁“并不缘于灿烂的学理,而缘于自存之本能而实现”^②。问题就在于,并非人人都是顾亭林,一能臻至如此境界,可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久而久之,在文字狱的淫威下,在功名和物质利诱下,出于对生存的渴望,作为适应性角色的读书人也就没有了别的出路,大多数人渐渐适应了这种坑陷天下聪明才力之士的陷阱,且以为这是人世间唯一的津梁了。于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③

当然,要让汉族知识分子进入其正常的轨道,就必须制定出一个像样的标准和规范。于是在清初学术的多声部的交响乐中,有一种声音无疑是其中的最强音,它的强势并非源自音乐符码本身的优势,而是噪音驯化的皇权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强势话语权。生物的进化得益于基因的变异,特立独行者倒很像那变异的种子,但令人困惑的是,人类社会却是在对这一变数的打击与虐杀中蹒跚前进,在对异已

① 章太炎《检论·哀焚书》。

②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之《中国人之德性》。

③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

的残酷诛杀中完成对人的独立精神的剿灭，各类复杂而森然的设置以及那高八度的旋律，使得大多数意志不那么坚定的思想者落入强势者之“彀中”。“专制时代，君主卿相操功名之权，以驱策天下士，天下士亦以君主卿相之好尚为准则。”^①这正是统治者的真正用意所在。“故（康熙）三十三年，考试翰詹于丰泽园，命题‘理学真伪论’，所以正人心、学术者，至为深切。”^②康熙所谓的“正”，就是要把一切不轨的“异端邪说”涤荡一清，一系列的整顿不得不使封建士子总结出一套全身的处世哲学。接着，赵慎畛在《榆巢杂识》中又记录一系列因文被祸的事例，如：“雍正间御史谢济世以参劾豫抚田文镜不实革职，发阿尔泰军前效力。经顺承郡王锡保参其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命留军前充当苦差。”（卷上，第16页）如此触目惊心的教训，不免使赵氏全身悚慄不已：“借托古人之事，冀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望，肆无忌惮，罪由自取。笔之以为小有才者戒。”这是读书人第一时间内真实心态的展现！

顺康两朝，满清政府在巩固政权上，一方面以兵戈铁骑来平息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清斗争，一方面则充分利用汉族的儒学来加强思想领域的控制。从表象上来看，顺治也好、早年的康熙也好，都曾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物力，搜集、编纂和注释古代的典籍，最后都冠以“钦定”或“御制”的名衔，这在数量上远远超出了以前任何一朝，做足了稽古右文、崇兴儒学的姿态。但问题的关键正在于，经过“钦定”或“御制”的儒学教本是否还是原汁原味的元典了呢？在历史的事实观照中，我们只能遗憾而又无奈地摇摇头，带着一种历史的沉重。

以《春秋》一经为例，王揆、张廷玉、李光地等几十位学者奉康熙大帝之命，编定了专门解说《春秋》大义的官书《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①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② 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页。